**土炕情——张策的故事**

1933 年 11 月，包家寨会议后，红四十二师党委派张策同志来南梁，作南梁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前期工作。张策来南梁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户户讲演。接着，习仲勋同志也来了。他们一同在南梁堡哥老会马大爷家里过罢春节，在马大爷帮助下，很快在以南梁堡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农村党支部、贫农团、雇农会、五个赤卫军大队。取得这样丰硕的成绩，自然令张策、习仲勋二位同志十分高兴。

1934年2月的一天，走村串户忙碌了一整天的张策、习仲勋，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地——马大爷家。马大爷的儿媳妇刘文英，脚勤手快，能做一手好饭菜，是当地有名的巧媳妇。刘文英用铜壶烫了一壶自家酿的糜子酒，做了几个下酒菜，端到了张策住的土炕头上。此时马大爷也赶回来了，在马大爷的作陪下，三人尽情地推杯换盏吃喝起来。不多时一壶香甜的米酒喝完了，刘文英又接着烫了第二壶。三人边吃边聊，当聊到联合会、贫农团、雇农会、赤卫军大队时，张策同志被目前取得的可喜成绩惹得心花怒放，三人又一次高举满杯庆贺。张策是陕西高陵人，从小爱秦腔，也会唱几句，这时就乘着酒兴，唱起了秦腔。唱到高兴处竟站了起来，边唱边舞着动作，这下坏了，一脚踹下去把土炕踹开了一个大洞，黑乎乎窟窿里冒着烟灰。张策见状，顿时感觉很不好意思，脸刷的一下红了。在一旁的马大爷忙打圆场说：“小老弟，没关系，我们这是打破黑暗的土炕，重建光明的新炕嘛！”三人不约而同地哈哈笑起来。

转眼五十年过去了，1984年，时任国家监察部部长的张策，情系老区，重返南梁。当张老看到这里的发展变化时十分高兴。他告诉南梁乡政府的同志，要到南梁堡马大爷家看看。南梁乡政府的同志告诉他，去马大爷庄上的路没修开，汽车到不了，只是一些羊肠小道，而且路上梢林（即灌木丛）很多，劝他就不要去了。但张老执意要去，乡政府的同志只得给张老准备了骑的毛驴。张老在工作人员陪同下，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看着这里一切，边走边看，还给他们讲述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的故事。走了近两个时辰，终于来到了马大爷家。他走进院子，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当年住的那个土窑洞。而此时，马大爷已过世三十多年了，当年给自己烫酒的年轻媳妇刘文英也已是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张老见了刘文英，二位老人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刘文英老人激动得噙着泪花说：“张大哥，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你还想着我们……”张老感慨地说：“怎么会忘记你们啊，没有你们当年的支持，革命怎么会成功呢！”在马大爷家里，张老和这里的人们寒暄了好长时间，刘文英老人又一次做了当地的荞面饸饹，烫了醇香的米酒，把饭菜端到了张老五十年前住的那个炕头上，招待张老。临别时，张老深情地拿出200元钱，一定要留给刘文英老人，刘文英不肯收，张老说：“拿着吧，这是盘炕的费用，欠你们五十年了！”

（刘永富）

**群众英雄张廷祥**

张廷祥，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靖边县宁条梁村。1929年，陕北大旱，土匪横行，饿殍遍野。因被逼无奈，在父亲带领下，全家逃荒来到陕甘交界的吴起镇楼房坪村居住。

来到此地，张廷祥父亲领着全家人起早贪黑，辛勤耕作，满以为这样能过上温饱生活。可他们哪里知道，粮食刚上场，地主就上门逼租逼债，民团上门强征，最后遇上土匪，干脆连张廷祥家仅有的一头耕牛，几块准备过冬缝被子用的大洋也抢了去，这无疑使他们雪上加霜，依旧过着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的苦日子。这给儿时的张廷祥留下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印象，这个世道，无论走到哪里，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也就是从那时起，张廷祥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对贫苦农民有用的人，团结起来向黑暗社会造反。

1931年，其堂哥张廷芝在吴起镇楼房坪的堡子上成立民团，招兵买马，扩充武装。号称要“清除匪患，除暴安良”。张廷祥一看，认为机会来了，二话没说，报名当了张廷芝民团的团丁。由于他出色能干，加之又是张廷芝的远方堂弟这个关系，干不多日，就被张廷芝破格提拔坐上了民团的第三把交椅，成为第二副团总（也就是当时说的三当家的）。本想这下可以大展身手，终于能为当地贫苦农民出头伸冤了。怎料想，张廷芝每次带他们出去，依然干着打家劫舍，强抢民女，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

看到张廷芝为非作歹，张廷祥又一次陷人了迷茫，后悔当初不该加入民团。痛定思痛，公开场合阻止不了张廷芝的恶行，暗地里将张廷芝抢上山的财物，偷偷还给受害的百姓。这样一来二去，张廷芝发现了他的行径，叫手下兵丁将张廷祥绑起来，毒打一顿，致使他全身多处受伤，几根肋骨被打折。痛苦难忍的张廷祥不但没有停止自己的行动，反而越发激起了反抗的决心。有一次，他悄悄地将民团抢上山的几名妇女放了。这次可闯了大祸。张廷芝一气之下，将他捆绑在一棵大杨树下，用皮鞭狠狠地抽了一顿，并押入死牢，准备“点天灯”①。

张廷祥同村的村民得知他被打入死牢，自发组织起来，拿起镢头、斧头上山要人，要求释放张廷祥。父亲张鸿昌也亲自上山求情，他答应只要张廷芝放了张廷祥，他一定会好好劝说，不让儿子再跟张廷芝作对。张廷芝这才允许留张廷祥一命，但不再让张廷祥当三当家的了，罚他当伙夫喂马，干些杂役苦差。

1933年11月8日，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政领导的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合水县莲花寺召开。会后，刘志丹、习仲勋等红军领导人决定攻打陕北，扩大根据地，并派刘景范、刘约三回陕北打探敌情。刘景范回家乡后到芦子沟、金汤镇、楼房坪秘密进行调查，当地农民诉说了张廷芝的恶行，同时提到张廷祥那个好后生，说他一心想为老百姓办事，由于势单力薄，惨遭毒打，险些丧了性命。

刘景范得知这一情况后，几经周折和张廷祥秘密见了面，两人一见如故。刘景范向他讲述了红军的革命主张和准备攻打陕北的计划，张廷祥当即提出要参加红军，一起闹革命。刘景范经过缜密思考，要求张廷祥默不作声，继续留在张廷芝民团当马夫，等待时机做内应，一举消灭张廷芝民团。

1934年3月，张廷祥通过我党在陕北的联络员张明科（后为保安游击队队长），给红军透露，张廷芝在吴起三道川的机炮营防范松懈，易于攻取。刘志丹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即带领红三团到三道川户沟岔，一举消灭了机炮营。将机炮营的枪械所打掉，其制枪制炮的工具、材料一并运回南梁。张廷祥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随同来到根据地，正式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刘永富）

①“点天灯”，是陕甘边一带封建社会传下来的一种酷刑，就是将人捆绑在石柱子

上，然后用一口大铁锅，将老麻子油或羊油炼成溶液浇在人身上，后用火点燃焚烧人

的身体，一直将其烧为灰烬，寓义“给天点灯。”

**习仲勋倡导兴办南梁集市贸易**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成立后，习仲勋同志被选为政府主席。虽然政务十分繁忙，但习仲勋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习惯。在一次深入基层时，一个新问题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习仲勋了解到：通过土地改革等措施，南梁一带农民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十分高涨，人民生活也有了好转，但南梁的集贸市场一直很萧条，当地群众的农、副、牧业中多余的产品无法销售出去，生活用品、生产资料在当地无处购买。这种状况也影响着红军部队在外围打仗时的后勤保障和军需供给。至于市场萧条的原因，经他调查发现，南梁地处偏远山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贸易的自然环境受到限制。更为糟糕的是其历史社会根源影响较深。南梁在清同治时期设过集市，但后来由于市场管理不善，奸商哄抬物价，缺斤短两，还时常有土匪窜入集市打家劫舍，因此没过多久，南梁的集市倒闭，时至1933年再也没有集市，市场交易活动随即停止。

针对以上问题，习仲勋认为应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南梁集市。随后他与张策再次深入农户，征求百姓意见。同时他观察到，马大爷家的院子经常来一些商队，有来卖盐的，也有来粜米的，习仲勋便上前跟商队的掌柜攀谈起来。在交谈中，习仲勋得知，马大爷为人忠厚、正直，做买卖公道、公平，在跟商人交易时仍然坚持使用十六两秤。那时，十六两称又叫十六金星秤。古人为了买卖公平，制约奸商短斤少两。在造秤时，古人把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及“福、禄、寿”三星，加起来共计十六星，用以作为杆秤制作的秤星，在定杆秤时，古人把这十六星作为一斤的计量。商人卖东西，要讲究商德，不能缺斤少两，如果耍手腕，克扣一两就减“福”，克扣二两就损“禄”，克扣三两就折“寿”。习仲勋同时还看到马大爷家用的那个粮斗、粮升，上面刻着“出入公平，公平交易”等字样，此时此刻习仲勋已明白马大爷家为什么经常有商队来做生意的道理了。

习仲勋回到寨子湾革命委员会驻地，当即召开会议，把自己调查研究的情况和在马大爷家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讲完后，习仲勋说，南梁集市成立不起来，还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人家马大爷在家里就有商人上门来做生意，我们怎么在南梁连个集市也设不起来？在会上，习仲勋给政府工作人员各自分了工，并确定了任务目标。会后，全体人员分头行动，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在习仲勋的倡导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陕甘边第一个集市。确定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接着又在白马庙设立了集市，进一步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为了市场的平稳和公平交易，也为了南梁集市贸易的巩固和发展，习仲勋下令，南梁集市上统一用苏维埃政府定制的“十六两秤”，粮斗上都要刻上或用毛笔写上“出入公平，公平交易，交易合理”等字样，用以提醒广大商人做一个有良心的好商人。同时要求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在集日上由郭锡山、宋飞带队上街巡逻，防止土匪窜入市场捣乱。

从此，南梁每逢集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叫卖声不断。集市上有当地人开的店铺、饭馆，也有从外地赶来卖盐、贩瓷、卖日用百货的。牲畜市场也十分活跃。当地外地的商贩云集，一起进行着公平的交易活动。

习仲勋倡导下的南梁集市贸易从此传了下来。时至今日，南梁的集市贸易仍然十分活跃。

**放羊娃当上了“劳动委员长”**

1934 年初春的一天，习仲勋、张策带领几名政治保卫队的同志，去离南梁堡几十里地的紫坊畔塔儿掌，办理公事。

塔儿掌有个大地主，叫胡克申，以欺压百姓、为非作歹闻名。习仲勋和张策路过胡家院子时，特意朝里面看了一眼，正巧看到胡家几个家丁模样的汉子，手里拿着长长的麻绳鞭子，左一鞭右一鞭地抽打一个瘦瘦弱弱、年纪约十六七岁的小伙子。那小伙子被绑在一棵大杨树上动弹不得，任那帮家伙抽打，只听得水蘸麻鞭抽打的噼啪声，与那青年“哎哟、哎哟”痛苦的呻吟声，不断从院里传出。

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张策心里清楚，这是胡克申又在欺压百姓了。于是，他们几人立即上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住那几个打人的汉子，习仲勋顺势将鞭子擎住，大喊一声：住手！为什么打人，这小伙子犯了什么法，你们如此动用大刑？那个大汉看了一眼来人，傲慢骄横地说：“哎嘿！你们是哪块地里的葱，竟管起大爷们的家事来着，让开、让开……再不让开，大爷就不客气了！”几个汉子还想动粗，说时迟，那时快，改治保卫队的同志一下子拔出盒子炮，用力抵在那几个家伙的后背上：“不许动，再动我们就让你们的脑袋开花。”几个家伙一看，有枪，顿时傻了眼 ，颤颤惊惊地说：“这，这 ……不管我们的事，这是我们掌柜的意思。”

胡克申正在家里炕头上吸大烟，一听院子里人声嚷嚷，一骨碌翻身下炕，手里提着大烟枪，傲气十足地问：“出什么事啦，你们乱哄哄的？”当一个家丁说：“老爷，是‘南洋政府'的人来了（当时人们把新成立的南梁政府误念成‘南洋政府'）。”胡克申一看，来了七八个年轻小伙子，手里还拿着枪，便一下子傻了眼，于是立马堆起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嘴脸，来到习仲勋、张策等人身边，说：“各位长官、各

位大爷，消消气，这是我们的家事，走，快到屋里坐，屋里请！”胡克申同时吩附下人：“还不快把人放啦！”

进到家里，胡克申越发殷勤，又是让座，又是端茶、递酒，毕恭毕敬地招呼，还命家里人“快杀鸡、宰羊，招待贵客！”习仲勋摆手拒绝了，要求他把刚才打人的事说清楚。

原来那个挨打的小伙子叫张钦贤，是南梁白马庙油房沟人，现年十七岁了，因家里弟兄、姐妹多，父亲是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家境贫寒，张钦贤身为长子，八岁时便被胡家雇来放羊。给胡家当长工一当就是十年，挨打是经常的事，张钦贤曾多次被胡家打的昏死过去，然后再用凉水泼醒。此次又遭毒打，是因为他头一天放羊，正值母羊产羔期，五百多只的羊群一天下的羊羔太多，张钦贤要把下的羊羔一只只从山里抱回羊圈，因距离较远，等他最后一趟赶往山里时，一只产

羔的母羊连同两只小羊羔都被狼叼走了。胡克申为此就发怒了。

张钦贤被解救了。他苦苦哀求习仲勋、张策带上他，他也要参加革命。习仲勋、张策同志把张钦贤带回家，跟其父亲说明缘由，但老实巴交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说：“参加什么革命哩！这不是胡闹吗？我家是本份的庄稼人，去革什么命？好娃儿，别去了，那些人势力大，我们惹不起呀！”说到这儿，张钦贤的父亲揉了揉自己的双眼，呜咽起来了。张钦贤没法，等到晚上父亲睡熟了，只身一人连夜跑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临时办公地一一荔园堡，坚决要求参加革命。习仲勋、张策看到张钦贤革命热情很高，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又介绍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张钦贤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年11月7日，在荔园堡召开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钦贤又被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长”。

（刘永富）

**落难女巧遇救星**

1934 年 7 月，阎洼子会议后，根据革命斗争形势需要，陕甘边特委、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组建红二团，任命刘景范为红二团团长，组建工作也由他来承担。受命后，刘景范随即带领警卫员刘文礼奔赴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玉皇庙川、白马庙川等地，准备从各路赤卫军大队、游击队中抽调优秀队员作为红二团战士。

这天，刘景范和警卫员刘文礼各骑一匹马，找白马庙川赤卫军大队长兼赤卫军总指挥朱紫卿（一些资料上为朱自清、朱志清），商量组建红二团的具体事宜。途经牛旺台的长湾沟时，发现半坡上一处庄院附近，有位年轻姑娘正将一根麻绳拴在树上，准备引颈自尽。刘景范和刘文礼见状即刻翻身下马，去阻止事情发生。刘景范从远处就喊：“唉，姑娘！别做傻事，有什么事跟我说。”还没等刘景范把话喊完，那姑娘已经上吊了。只见刘景范、刘文礼三步并作两步飞一样爬上半山坡，快到跟前时，刘文礼一个箭步上去，用尽全力将吊在树上的姑娘抱了起来，使那位姑娘脖颈上的绳子松了劲，接着刘景范侧身上来，从腰间拔出防身匕首隔断绳子。二人将那姑娘仰面平放在地面施救。一会儿，那姑娘慢慢睁开了眼睛，看了看身边的二位恩人，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刘文礼在一旁安慰说：“别哭了，有什么事跟我们首长说。”但那位姑娘非但不听，反而哭得更加凄惨、伤心。刘景范对刘文礼说：“先别劝她了，让她哭吧，哭出来也许会好受些。”那姑娘哭了好一阵，才慢慢地停了下来，她看了看眼前二位男子说：“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还不如让

我死了呢！”刘景范看那姑娘情绪稳定了一些，便问：“姑娘，你是哪儿人，为什么要走这条不归的黄泉路呢？”姑娘这才呜呜咽咽地诉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姑娘姓惠名长英，家住附近，家里有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共八口人。长英今年19岁，排行老大，原本生活就比较拮据的家已令长英和母亲十分痛苦，但长英还有一个不争气的爹。长英爹因祖父在世时，生活比较富裕，从小养成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习惯，等长英的祖父一过世，他更是变本加厉，经常走东家串西家摇钱耍宝，后来又慢慢地染上了大烟瘾。这样，原本殷实的家庭渐渐变得穷困潦倒，在外还欠了人家一屁股赌债、大烟债，发展至今已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弟妹经常饿得哇哇大哭。更为烦心的事情这时也发生了，到长英家逼债的财主、流氓、二赖子日渐增多，他们颜繁登门，耍横强逼。长英爹欠赌债、烟债最多的是白马庙川一姓郭的财主。郭财主一看惠家这下完了，三天两头带着家丁往长英家跑。一来逼债，长英爹就说没钱，等有了还上，但郭财主哪里听得进去，紧逼不放，在逼债未果的情况下，郭财主把眼珠子一转，心里有了歪主意，他把目光投

向了长英。他看长英长得如花似玉，便对其爹说：“没大洋也好，从古到今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姓惠的，那就把你的大丫头抵债，给我作个偏房，咱们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另外再给你一些烟土， 你看怎样？”母亲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而长英爹此时烟瘾又犯了，哪里听得进去，再说郭财主这样“大方相助”，便一口应允此事。经郭财主与长英爹商量决定三天后娶亲。可怜的长英一听尤

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哭得死去活来，一来她不愿嫁给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老男人，还因为她从小就和邻居赵德胜一块儿长大，两人青梅竹马，且已暗订终身。在此前，两人也多次向双方父母说明姻缘，怎奈长英爹爱财如命，嫌德胜家穷，说什么也不肯答应，而此时负债累累的长英爹又把郭财主看成是自己的活菩萨、救世主。可怜的长英四处求救，德胜也因家里太穷，一时半会儿帮不上忙，长英在求救无援的情况下便走向了前面的那一幕。

站在一旁的刘景范和警卫员刘文礼，此时早已摩拳擦掌，愤愤不平了，刘景范把手一挥说：“文礼，把长英领上去她家，等我们把她的事办了再走也不迟！”就这样刘景范、刘文礼来到了惠长英家里。

经过耐心细致的劝解，刘景范终于做通了长英爹的思想工作，她爹答应不将长英嫁给郭财主，自己也不再玩赌，惠家情况暂时有所缓和。随后，刘景范、刘文礼调转马头回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地，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习仲勋当即带领政治保卫队工作人员，与刘景范一道二返惠家展开彻底调查。经过调查了解，习仲勋派政治保卫队的同志将郭财主及所有参与玩赌的赌棍、二流子、大烟鬼押了回来，召集群众大会。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大会决定，对罪大恶极、称霸一方的郭财主予以处决，对参与赌博的赌棍、大烟鬼则押往政治保卫队进行改造处理。惠长英与自己心爱的德胜哥在习仲勋、刘景范的支持下喜结良缘。

通过这一事件，长英与德胜夫妇十分感激，同时，对共产党、陕甘边政府也有了认识和了解。在长英请求下，他们二人都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德胜还参加南梁游击队，成为一名出色的游击队员，长英参加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后来当上了妇救会主任，专门从事妇女工作。

（刘永富）

**半个元宝**

1934年2月，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后，红军、游击队队伍日益壮大，革命战士越来越多，红军后勤供给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而南梁地区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且农户少，住的分散，这给搞政府工作、后勤保障的习仲勋带来了巨大压力。面对这一情况，习仲勋召集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呼志录、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等人，共商解决办法。他们决定在南梁周边为红二十六军征集军粮。在商议中，习仲勋特别强调：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全天下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此次征粮，一定要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实行买卖公平的交易原则，绝不允许强征强买、有损老百姓利益的事发生。但目前我们的经费也很困难，注意节约开支。

征粮活动开始后，由习仲勋带队，郑德明、马俊华负责联系粮食卖主，杨玉亭、张怀贞筹措买粮经费，呼志录、郭锡山带六名政治保卫队员负责押运。他们一行十几人的队伍，沿陕甘边的梁峁、沟川，边行走打听，边宣传动员。行走几十公里，来到保安县旦八镇吊坪村。这里川宽地广，土地肥沃，农户较多，而且有几家种粮大户。当地老百姓听说他们是“南梁政府”的，是为红军征粮的，都纷纷慷慨解囊，将家中多余的粮食交给红军。习仲勋让工作人员全部称过数量，付给粮款。有部分农户说什么也不要钱，要将粮食无偿捐给红军，习仲勋婉言谢绝，他向老百姓耐心解释征粮政策、工作纪律，然后照价如数付钱。这样，不到两天工夫，习仲勋及其工作人员就征集荞麦、糜子、谷子等粮食二十余石。

在征集一户曹姓农民的粮食时，按价应付大洋五十块，五两小元宝一个。五十块大洋由时任财政委员张怀贞当即兑付，但五两元宝，着实让人为难，因当时陕甘边财政委员会的经费中没有五两元宝，大的五十两，小的十两。曹姓农民见状对习仲勋说：“那五两元宝我不要了，本来我也打算给红军捐一些粮食的。”但习仲勋表示，我们是有纪律的，无论干什么，绝不能亏欠老百姓，你们的生活也不容易。最后，习仲勋果断对张怀贞说，想办法把钱付给人家。张怀贞只好找来当地铁匠，用钢铡将一个十两元宝从中间一分为二，半个付给卖粮户，半个拿回财政委员会。

事后，张怀贞又从自家拿了一些粮食等军需物品，交给粮食委员会委员长呼志录。为奖励张怀贞，边区政府将从吊坪村拿回的半个元宝给了他。从此，张怀贞全家一直把这半个元宝珍藏着。

如今，那半个元宝被张怀贞的孙子张锁娃完好无损地传了下来，继续珍藏，永作纪念。

（刘永富）